穿梭于乡间小路的独臂“鸿雁”

在累计70万公里的邮路上，他的投递准确率几乎是100%

一身深绿色制服，黝黑的皮肤，开朗的笑容，满是油墨的左手……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在浙江台州临海桃渚镇的邮路上，总能看到这位独臂投递员穿梭于乡间小路的身影，他就是被人们称为独臂“鸿雁”的郑小平

▲独臂“鸿雁”郑小平开着电瓶车为村民送信件和包裹。 新华社发

31年风与雨，70万公里云和月

郑小平右手先天残疾，只有一只左手，1988年当地邮局要招聘乡村投递员，郑小平通过考试，走上投递岗位。以自身条件当上投递员，让郑小平感激万分，下定决心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31年来坚守这份工作的背后，他比别人付出的更多。数报、拆报、插报、套报对其他投递员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对他来说刚开始时却是如此艰难。

数报、拆报100份的量，其他投递员几分钟就能完成，而郑小平刚开始时要花一个小时。但他从不气馁，每天下班回家后就拿出旧报纸不停练习，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做得和其他投递员一样熟练。

郑小平负责的山区邮路崎岖陡峭，杂草丛生且都是荆棘小径。山上5个行政村人口分散，他常常肩背一袋邮包，一手还要拿一袋邮包，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个邮路来回，往往是早上6点上山，下山的时候已是日落西山。

1998年后，山区村庄的村民们陆续搬迁到山下生活，郑小平也随着村民的搬迁而调整了投递方式，逐渐从步班邮路，改为半步班半自行车邮路，最后改为自行车邮路，于是桃渚镇的村落里就有了一个穿梭在大街小巷、单手骑车的投递员身影。

每次投递都要载上三十多公斤的报刊，又是单手骑车，容易失去平衡，郑小平经常摔得青一块紫一块。为了练好单手把握平衡，到家后他将自行车载上四五十斤重物在小路上练平衡，就这样一步步练习，不管有多重的报刊放在他车上，他都能骑得轻松自如。在累计70万公里的邮路上，他的投递准确率几乎是100%，从未出现缺报少刊、错投漏投报刊信件。

考生们的报喜鸟，乡亲们的贴心人

郑小平总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帮助别人。1997年，他在投递途中遇到一位叫郑学通的村民，那是一位50多岁的残疾人，只能依靠双手撑在两条凳子上走路，独自一人生活，头发已经有一尺多长。

面对此情此景，郑小平挑起了照顾郑学通的责任。细心为他理发，每次投递路过他家，都为他干一些家务活，跟他谈谈心，总会带些生活用品给他。郑小平就这样照顾了郑学通整整12年，一直到他去世。

每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关系到一个个学子的前途，这一重要任务需要邮递人员有高度的责任心。“一定要把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手中！”郑小平说，这些年来他手上送出的录取通知书超过2000份，背后是2000多个家庭的殷切期盼和焦急等待。

黄官强是临海杜桥中学的一名毕业生，2008年参加高考，当郑小平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地址找到他所在的芙蓉村时，发现他家已经搬迁，但不知搬去了哪里。8月烈日当空，郑小平就在芙蓉村一户户询问，直到有人告诉他，黄官强一家搬到了下宅村。

于是他又马上赶赴下宅村，挨家挨户找人，在几乎走遍整个村落的时候，终于找到了这名考生。黄官强回忆说：“郑小平叔叔找到我时，他的衣服已经全湿了，脸被晒得通红，递给我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一刻，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

信件少了包裹多了，见证邮递时代变迁

随着网购、快递物流的发展，2012年，陪伴郑小平行走了多年邮路的自行车“下岗”了，他换了一辆三轮电瓶车继续奔波。“我还特意让店里帮我把油门从右手换到左手位置，这样骑起来更方便安全。”郑小平说。

“以前一天最多时有200多封信件，现在平均一天差不多50封信件。”郑小平说，现在的信件中几乎看不到手写书信，基本上都是银行对账单、司法通知书、水电费表格之类的。

如今，快递包裹成了邮包里的“主力军”。“过年前好多村民的子女从外地给家里寄来年货，每天三轮车都是满的，送到村民家里时，他们都非常高兴欢喜。”郑小平说，虽然包裹大了重了，但看到乡亲们对服务满意，自己心里也感到满足。

近几年“家电下乡”，郑小平向村民介绍了这一便民服务，每年都会给村民们配送十多台冰箱，并帮助他们顺利拿到政府“家电下乡”补贴，做好服务。

还有32个月，郑小平就要退休了。31年来邮政局里多次要给他安排到其他“轻松点”的岗位，他总是婉言谢绝：“这条邮路的村民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要在邮路上一直走下去。”

（记者黄筱、许舜达）据新华社杭州电

生命接力背后的帮扶『真经』

本报记者艾福梅、谢建雯

近日，5岁的豆豆（化名）病愈从北京回到宁夏，她的家人专门带着孩子来到宁夏儿童医院，送上锦旗。

看着孩子脸色红润，终于恢复了健康，该院儿童重症监护室（PICU）主任张军红很是欣慰。三个多月前，她曾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专家携手，数次将这个5岁小女孩于生命垂危之际抢回，还曾跟随救护车14小时、奔波1100多公里护送豆豆从宁夏转诊北京……豆豆这个“棘手”患儿，正是京宁两地医院对口帮扶效果的一次检验。

死神手里抢生机

豆豆是宁夏固原人。2018年9月初，豆豆因受凉感冒发展成肺炎，在当地接受常规治疗后病情反而加重，除咳嗽、咳痰、发热外，还出现呕吐、吞咽困难等症状。据了解，豆豆当时整个人软趴趴的，扶都扶不起来。9月17日凌晨两点，豆豆被紧急转诊到宁夏儿童医院的PICU病房。

张军红介绍说，患者情况是否危急，主要看其能否依靠自主呼吸生存，而豆豆当时呼吸困难、咳不出痰，自身吸入的氧气已无法正常维持生命，危在旦夕。于是，她一边带队抢救，为豆豆实施气管插管呼吸机支持呼吸，一边紧急请正在医院挂职的北大医院儿科专家汤泽中会诊。

赶到急救现场的汤泽中有着多年的重症儿童救治经验。他诊断认为，豆豆起初确实是普通感冒，但因体质特殊，感染诱发了严重的免疫反应，并损伤到脑干和脊髓。

汤泽中随后带领儿童重症团队开展拍背、吸痰、免疫抑制等治疗，并多次与北大医院专家远程会诊，还邀请来宁夏讲课的北大医院儿科专家会诊，共同为豆豆制定严谨、精准的救治方案。

核磁共振是确定豆豆病灶的一项重要检查，也是下一步治疗的重要依据。但宁夏儿童医院没有核磁共振设备，只能联系到其他医院去做。更困难的是，核磁共振检查不能带任何金属物，豆豆却需依靠呼吸机生存。为解决这一难题，张军红事先踩点、协调，提前多次演练人工技术辅助呼吸。最终，克服重重困难，为豆豆做了检查。

确定病灶后，豆豆在对症治疗下病情逐渐好转，生命体征开始稳定，肢体活动逐渐恢复，但自主呼吸功能仍比较弱，无法脱离呼吸机。在家属要求下，也为了给豆豆争取更好的治疗，汤泽中、张军红和北大医院专家再次会诊，主张将豆豆转诊到北大医院。

转诊的想法得到两家医院的全力支持：宁夏儿童医院从其他医院协调了一辆高配置转运救护车，并妥善安排好转运途中所需；北大医院则开通绿色通道，为豆豆预留床位，安排接诊专家。

10月23日凌晨，救护车载着豆豆从银川出发，张军红和一名护士随车护送，这是宁夏儿童医院历史上第一次由本院医生护送病人转诊外地。“14个小时基本没有合眼，一直盯着孩子，拍背、吸痰、给药，不敢让孩子在路上出一点点事。”张军红说。

低迷之中谋发展

豆豆的病在大医院专家的眼中或许并不罕见，但对宁夏儿童医院的医生来说，却是首次见识。

张军红说，宁夏儿童医院是新医院，如果没有北大医院老师数月以来对他们医疗救治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没有北大医院的老师在身边做技术支撑，面对豆豆这样的棘手病情，他们或许只能跟往常一样——不敢接收、安排转院。

其实，宁夏儿童医院说新也新，说老也老，目前还只是二级妇幼保健院。在宁夏人眼中，尽管该院挂有自治区级的头衔，其诊疗水平却远不如同级别医院，甚至不如一些市级医院。

张军红在加入宁夏儿童医院前，已经从事重症监护工作8年，服务对象主要是成人。得知宁夏儿童医院要组建PICU，她应聘而来。张军红记得，习惯了忙碌的她那时突然发现自己“闲”了下来：“病患少，压力也小，日常工作相对轻松，但那会儿人人都很迷茫。”

张军红很快意识到这种情况不正常，因为：“没有哪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这样‘清闲’。”

2017年12月，在自治区卫生部门的牵头支持下，宁夏儿童医院和北大医院签署合作协议，建立儿科专科医疗联合体。根据协议，北大医院每年选派一名高级职称专家到宁夏儿童医院担任副院长并常驻宁夏，每年选派5名专家常驻并参与医院管理和科室管理，且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3个月；双方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和疑难杂症远程会诊中心等。

自治区卫健委主任马秀珍表示，希望借助北大医院儿科的品牌效应、优质医疗资源和先进管理模式，帮助宁夏儿童医院在临床、教学、科研、管理、公共卫生等方面实现显著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2018年1月，汤泽中来到宁夏儿童医院担任副院长，协助分管医院儿科医疗、医务、科研等工作。尽管曾有过在云南、山东、西藏等地的技术帮扶经历，但汤泽中坦言，宁夏儿童医院当时的状况仍出乎他的意料：“技术储备力量弱、人心浮动、士气低沉，比我想象的还要弱一些。”

汤泽中遂以自己和北大医院的医疗资源为支撑，鼓励宁夏儿童医院的医生把更多常见病患儿收进来、把疑难重症患儿留下来，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找到自信。

作为业务副院长，汤泽中还组织医院各个科室开展急救培训演练，完善急救流程，并建立三级查房、儿科系统大查房大讨论、院内会诊等制度，帮助医院建立科学、合理、规范的诊疗机制。

对口帮扶增实力

张军红说，汤泽中的“三把火”烧起来后，医院职工普遍觉得这次不一样了。

她还记得，在把豆豆送到北京的第三天，医院急诊科来了一位急性喉炎、喉梗阻达到Ⅲ度的患儿，患儿家长起初认为孩子病情不重，不愿住进PICU。经过急诊会诊，张军红甩下“孩子要活命，必须跟我走”的话后，抱起孩子就从四楼往五楼跑。在患儿的相关治疗告一段落后，张军红找来患儿家属，为其画图解释喉炎的危害性以及喉炎致死的案例，家属这才感到后怕，甚至哭了起来。

事后，汤泽中说张军红“胆子真大”，但张军红认为，她的胆子其实是北大医院的专家们给的：“我始终记得汤院长说过，‘面对生命时，没有任何推脱的理由’。”

宁夏儿童医院PICU的医护人员表示，他们这一年在汤泽中身上学到的太多。在他们遇到疑难问题请教汤泽中时，得到的除了答案往往还有一堆资料；治疗时，汤泽中又总能想出各种小妙招减轻病患痛苦；无论再晚，汤泽中坚持要在第一时间得到重症患儿的情况汇报；只要不出差，汤泽中始终早晚两次查房，掌握一手情况。

在张军红看来，北大医院的这种帮扶最接地气，因为在与专家的朝夕相处间，医护人员看到了榜样、获得了技能。“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有内驱力。放在我们医生身上，就是你首先得有当好大夫的信念。但好大夫长什么样？汤院长和北大医院的专家就是活生生的榜样，这样医护人员有了明确的职业定位，就会努力靠近。”张军红说。

据了解，在一年的帮扶时间里，不仅是张军红和她的科室，宁夏儿童医院整体都发生了变化。比如，各科室不再“单干”，相互间的沟通交流多了起来，遇到抢救，从医技、药剂到后勤可说是一呼全应；又如，医生们更有底气留下疑难患儿，在实战中不断成长。

汤泽中说，目前的帮扶还只是开端，尚不足以实现向优质的飞跃，但起码已经看到目标和方向。只要两家医院久久为功、持续施力，5年后的宁夏儿童医院应能成长为学科齐全、初具规模的儿科专科医院，10年后，则有望在地区形成一定影响力。

倔老头“化缘”25年资助431名贫困生

眼看学生成才了，老人却走了，但爱心人士接续了老人的事业

20世纪90年代初，石门县经济不发达，失学儿童多。1993年，文非动员20多名教师成立了石门县白云乡扶贫助学基金会，由他担任会长一职。就这样，文非的“化缘”之路开始了

周围的人笑话他，当教书的没出名，结果退休当“叫花子”出了名

文绍杰永远记得父亲文非出殡的那天，雨雪交加、寒冷刺骨。看着满院子自发来给父亲送行的人，文绍杰感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此刻，他才完全理解了父亲的“倔强”：25年如一日地募集资金，资助贫困学生。

如今，接受资助的431名贫困学生中，已有216人大学毕业，不少人正在资助他人。爱心人士姚兰华和她的团队还成立了文非基金会，接续着老人的事业。斯人已逝，精神长存，这份大爱仍在延续。

从25元到220万元：文非坚持“化缘”25年

1990年，文非从学校退休了。本该享福的年纪，文非却有着重重心事：白云镇有太多孩子读不起书。

白云镇（曾称白云乡）位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地处武陵山片区。20世纪90年代初，石门县经济不发达，失学儿童多。文非的同事周翔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个班入学时有60多人，最终毕业的只有30几人。

没钱怎么办？找人捐。1993年，文非动员20多名教师成立了石门县白云乡扶贫助学基金会，由他担任会长一职。就这样，文非的“化缘”之路开始了。

“周围的人笑话他，当教书的没出名，结果退休当‘叫花子’出了名。”周翔回忆：“一开始，募捐之路困难重重。”

“我可以不吃饭不喝水，但这钱是救学生的，你多少给点才能打发我走！”文非找到几个老同事“耍赖”要钱，最终募得第一笔助学款——25元。

他奔波了3天，收获25元。虽然不多，但总算没有空手而归，这让文非更加坚定了信念，“一定能弄到钱，一定要救孩子。”

为了得到捐款人的信任，基金会接受的每笔捐款都会开两份票据，一份给基金会，一份给领款学生或家长，并签上学生、家长和班主任三个人的名字，以确保款项不被挪用。慢慢地，村里人开始10元、20元地捐，几年后已累计数万元捐款，募捐的范围也逐步扩大。

到2018年，基金会共募得220多万元，先后资助400多名学生，其中200多人大学毕业，3人读研，多人考取了重点大学。

眼看学生成才了，文非却走了。2019年2月12日，文非因病去世，享年89岁。

家人不理解，但要让捐助人放心

20多年来，文非四处奔波，无暇照顾家庭，甚至“冷落”了家人。

十多年前，文绍杰的一双儿女先后考入大学。临近大学开学，文绍杰的儿子提出需要一台4000元的笔记本电脑，这让务农的文绍杰犯了难，他想起之前有贫困学生从文非的基金会贷款上学的先例，于是他找到了父亲。

“孙子孙女读书要花一万六千元，孙子现在需要电脑，我找您贷款周转一下，我还利息。”文绍杰对父亲说。

“你自己想办法。”文绍杰怎么也没想到，父亲只撂下一句话。

“当时又埋怨又生气。”无奈，文绍杰只好带着妻子和儿子上竹园砍竹子，花了5天时间凑齐了买电脑的钱。

文绍杰知道父亲怕别人不信任他。“直到他离开人世，我才慢慢懂了他做这些事的意义。”

为确认受资助对象的真实情况，文非亲自跑到学生家里考察，还会向周围邻居了解情况。

今年53岁的文书国就经常骑着摩托带着文非穿梭在大山之间。“有一次我们下了摩托又爬了2个小时山路才到学生家里。”文书国说，“正是有这样坚定的精神，别人才愿意相信他。”

▲文非生前与学生交流。 新华社发

文非还把每一笔款项的用处写明，编成《爱心简报》寄给捐款人，并附上学生近况。到2017年，已汇编143期《爱心简报》。

2017年底，文非病重。他为基金会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安排好2027年以前资金的使用情况，将60万元善款移交给常德市教育局管理发放。

从“文爷爷”到“文非基金会”：背后是一种精神和能量

这位耄耋之年老人的爱心一直在传递。多年前曾受资助的学生一个个出人头地，又回到家乡资助他人，一大群爱心人士成为基金会的坚强后盾。

曾受资助的龚华玉，近年来扶助了两名贫困学生，其中一人考入厦门大学；在上海工作的白云镇籍大学生龚玉用，成为上海募捐点的发起人，不仅自己捐款近3万元，还发动同事对口扶助，共引捐17万多元；石门县91岁的退休干部文敬德将捡废品的2万元积蓄捐给基金会……

文非把捐赠人的名字记在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现在，这个笔记本里已记载了近3000个爱心人士的名字。

文非的追悼会上，200多人自发前来为他送行，爱心人士姚兰华连夜驱车带着自己资助的学生谢馨怡来到现场。

“每次见到文爷爷，他都教导我们要学会感恩。”13岁的谢馨怡哽咽着说。

2018年底，姚兰华和她的团队成立了文非基金会，继承文非的事业，资助奖励贫困学生。

除了出资助学，姚兰华每年还带十多个孩子去北京参观学习。姚兰华认为，这些孩子不仅需要钱，还需要陪伴和管教，更需要开阔眼界。

姚兰华最后一次见到文非还在和他商量基金会的事，“基金会的名字我想就叫芷兰香，很好听……”文非还没说完，姚兰华抢着说：“我们不是为了要一个好听的名字，我们要的是‘文非’这两个字所赋予的精神和能量。”

（记者陈梦婕、高文成）据新华社长沙电